



中国人的生活系列

南国细节

刘博智 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目录(CIP)数据

南国细节 / 刘博智著. —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9.8

(中国人的生活)

ISBN 978-7-5452-0316-5

I.南… II.刘… III.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广州市-

摄影集 IV.D619.65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9046号

总 策 划 王 刚

执行策划 颜 文 斗

责任编辑 金 嵘

封面设计 胡 斌

技术编辑 李 荀

书 名 南国细节

著 者 刘博智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邮编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X1092 1/20

印 张 7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316-5 / J.251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中国人的生活系列

南国细节

刘博智 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中国人的生活系列

已出书目

:: 家在青岛 / 吴正中

:: 温州活路 / 萧云集

:: 南国细节 / 刘博智

他的照片是由细节构成的，说话的是其中零零碎碎的物件。众多的物件构成生活的场景，通过物件和场景关联到其中人的生活，同时关联到大的社会政治背景。他的照片是“图像物语”——满目琐碎，但表现生活的符号在鲜明地跳动：物件杂处，但细节丰满清晰可一件件细细玩味；物象静态不言，但每一件物品都在诉说历史；虽是历史，却仿佛就在昨天。

他的照片最好的阅读方式是，将照片放到和真实场景一样的大小，组成一间房子的四壁（比如广州海珠区刘姓家庭），读者搬一把椅子坐在其中，从容指点回味我们过去的生活。

历史的文本不仅仅是几条史纲、几个英雄人物、几场会议、几件大事。生活是历史的细胞，构成血肉、神经和脏器，没有细节的历史，是了无生机的骨头架子。

——颜文斗

上架建议：摄影 文化

ISBN 978-7-5452-0316-5



定价：32.00元



中国人的生活系列

南国细节

刘博智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总 策 划 王 刚

执行策划 颜文斗

目 录

序 回乡/7

1979—1982 广州家庭/11

1981—1982 农村家庭/57

1981—1982 集体景象/89

1979—2000 人物/109

1979—至今 南方事象/133

附：1979 首都印象/145

知微见著的图像文物/159

回乡

刘博智

1979年，是我成人之后的第一次还乡。踏过罗湖桥，来到广州城。一切都很新鲜、什么都很好奇。30年很快过去，回忆起这第一次，好多细节都难于忘记。我就记下这难于忘记的小事，作为本书的序好了。读了这点零碎的文字，诸公可能更仔细地阅读我的照片，因为我的照片主要是由零碎的物件来说话的。

妈妈告诉我，在1953年，我才3岁，她曾带我从香港到广州探望外公。长大后，我实在记不起这次的经历，一切都忘却了，包括外公。那个年纪，我就是要玩、吃、撒尿和撒野。虽然家里经营一间在楼梯底下的名叫品华的小商店，雪条、吹波糖不敢吃，可乐、生力啤不敢喝，因为自家卖的要赚钱，不能随便吃老本，那是个标准的规矩。有时我会快速地打开瓶盖，拿一小片散装朱古力或一粒话梅，闪电式地放入口里，不作声，以平常心上学，未漏过一滴口水。人心肉做，小孩子也要解压，这些我不赖。

1961年，店里多了一门生意，是代寄包裹到中国，包括寿星公炼奶、阿华田、雀巢咖啡、罐装花生油、白糖……母亲也曾多次带旧衣服、鞋物和大米回广州。我那时的小脑袋闪了一下——一半的东西来自中国，用旧的怎么又搬回去？

小时候是个街童，就读于东华三院义学。一开始我信心不足，因小学一、二、三年级都留级，四、五年级补考，在六年级毕业是个谜。通过大哥的帮助，我挤进了英华书院，但心里有愧。果不其然，直到中五我都在“肥佬”（不及格）边缘徘徊，自知不是什么好料，令我更加自卑的是，香岛中学的一些学生，每日都来我家的便利店买零食。这间学校由来自大陆的教育专家管理，出了名的成绩优异、纪律严明。于是，中国大陆在我年轻的心里变得更加神圣。1969年，父母借钱把我放了出洋（出国），历经10年摸爬滚打后，带着个金发老婆回乡。

当时的中国，对我而言是陌生的，只是从杂志和报纸上知道她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1979年，夏天的广州很湿热。亚婶带我去探亲，在海珠、荔湾区附近。街上人虽多，但店铺多是关着的。晚上，在市中心开车的司机都不打前灯，因为要省电。外墙柱子都是灰白色，楼宇旧楼梯窄，楼里三层都没灯和扶手。我们摸着墙上楼，屋内又暗又小，灯泡是15瓦的，灯管小得像条热狗。一层楼五六家人，厨房和洗漱间都是公用的，上厕所要到街外的公厕。远亲都叫我忍着，年轻自有本钱，亚婶则要在厨房用痰盂解决。

其实远亲们都没见过我，何况还带来个番鬼妹（洋妞），比他们家墙上挂着的香港

月历上的模特“仲劲”（还好看）。各种年画和挂历上，革命领袖、仙女与明星的玉照相映成辉，但就是看不到外公的相片和神位。我问的时候，他们支吾以对，一定是听命令破旧立新，扔了不好意思说。但他们对高大的番鬼妹更感兴趣，来回量度，仿佛做全身检查。而我则开始细看每一个房间、阁楼和墙壁，简单的家居陈设中已经有一些声宝、三洋、飞利浦等日本、欧美名牌电器，有些还放进玻璃柜里，有些则用纱巾盖着。我一一拍下这些细节，觉得会帮助我理解远亲们的生活和价值观。因为在我回乡之前，这一切都无从得知，媒体亦未见这些报道。他们答我的问题，我也不大切实明白。比如说，有些远亲去了河北、海南岛、西藏和内蒙，很久没回来了。为什么呢？

两年之后，几位亲戚认识了我，逐渐告诉我一些缘由。在六七十年代，有不少的知识分子、旧地主、有海外关系的人要下放劳改。有的年轻人被发派到其它省份去“再改造”。家庭成员、父母与夫妇被告知要互相告发。有些人就要“坦白交代”，带着写有“罪犯”字样的木板游街。有些还被迫害至死。

我曾经拍了一张挂在墙上的夫妇合照。他们的儿子告知，照片中的父亲在20世纪60年代跳河自杀。我爬上阁楼看睡房时，照片上的那对眼睛就瞪着我，让人觉得他的鬼魂还在游荡。在脑海里太多这样的碎片，难以拼凑起来。有些人可能简单地认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人会蔑视逻辑、价值观和理智；也有人认为这就是政治的“龙争虎斗”；亦有人认为这是有因必有果，历史会以不同的方式重演。

我觉得人是健忘的。有些人比别人更天真。我的舅舅，生于台山，在香港岭南中学读书。当时响应回归祖国建设新社会的号召，和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一样，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回到大陆。数年之后，却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以有海外关系的名义，被当作是间谍和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知识分子。

舅舅是一个有海外关系的极端理想主义者，从事建筑绘图，并没有被整得头破血流。但后来他病得太严重，就被允许我妈妈带他去香港，在1975年住进了香港青山精神病院。他进进出出，就被人当作是疯子。他不时会来探望住在旺角的亲戚，经常用刀找东西削，同时咒骂他所认识的在广州的人。我的亲戚，包括他母亲在内，都与他划清界限，令他大受打击。加上一个人住在石硤尾的一间无窗铁皮屋，更令他觉得孤立无援，伤心失意。在中秋后的一个晚上，他在小铁皮屋外坐着，跌下来便去世。在认尸时他的妹妹只记得他浮肿的双腿……

有时我还发现，处于过渡时期的中国，很多事情都饶有趣味。

远亲问我：“去派出所登记了吗？”

“什么是派出所？登记什么？”原来所有境外回来探亲访友的华侨都必须在当天到公安局派出所登记报到。我们探访过卅多户亲朋，从没人打小报告。

.....

我说：“今晚想请你们一家去吃饭。”

“不用啦，浪费太多粮票。”

“什么是粮票？我用外汇券，没问题。”

“不如你把外汇券和我的人民币兑换吧，我可以买辆单车。现在我去河南自由市场买条鲩鱼，3个小时后回来，你先回酒店休息，6点再来。”

我想，买条鱼要3个小时？！外汇券能买，为什么人民币不能？因为中国需要美元。

一个人在街上逛，经过一间大百货商店，人不多，摆放了十多辆崭新的单车，售货员爱理不理。我要买单车，她却坚持不卖，到办公室找经理也不卖，用外汇券也不卖，而且不给任何解释！在他的办公桌玻璃下，压着一张由一位美国记者拍的周恩来总理坐在枣红沙发上的侧面照，很帅。我对经理说，“如果周总理要买单车而买不到，可恼了吧？我就没这特权。”

入夜后，到处都很昏暗。经过一个摆满几百辆单车的保管站，正要觅路而过，突然听到多次碰撞的声音，定眼细看，原来是个盲人进入了“迷宫”，半弯着腰狼狈地找出口。我将他从乱堆中拖了出来。原来是一位从湖南来广州行乞的，那时叫“盲流”。我扶着他走到一根柱子旁，让他坐下，用他手中的破碗向小食店的服务员要了些开水，把第一道脏水泼了，又再要一碗。但这店没有面条、河粉，想光顾也无货可卖，开水也就算是白给的了，那服务员还向我投了个很奇怪的眼光。我在附近买了两个菠萝包给这位六旬的湖南老人。他的话我一句都没听懂，离开后我再回头看看，他的碗、面包和嘴都在颤抖。

他为何要离乡？跟我有何区别？

乱逛了几条街，在骑楼底下，遇上了一个卖云吞面的肩挑小档。3毛钱一碗的云吞面，汤靚面细，又弹牙（有韧劲），云吞也地道，半肥瘦的猪肉酱加鲜虾碎，我边解馋边观察自由个体户创业的谋生工具——煤炭炉、碗柜、物料柜、葵扇、汤锅和4张小木椅，这些在香港已找不到了。

转了几条街已迷路，有一家卖清热绿豆沙的食铺还在等客，6毛钱一碗。我叫了

一份，站在铺外吃。这碗东西是糖加水、加色，再加6粒绿豆。在我后面的一对中年夫妇，喝了两口便大骂，“呃（骗）香港人就好啦，本地人都呃（骗），咁衰（这么坏）！”没用广东粗口，很难得。看着那面不改色的老板，我自觅归途。

一个月下来，在中国游了不少名胜，准备出关回香港。在行李堆前忽然想起了有位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家，被派来拍摄刚刚对外开放的中国，出关时，被边防官员拿走了近100个Kodachrome胶卷，坚持认定他是个间谍。海关把胶卷在广州冲了检查，全是一片黑，什么都看不见。因为这种胶卷只能在柯达工厂冲，与普通的Ektachrome E-6幻灯片不一样。边防随后不得不放人。这回轮到我了。在关口，我让洋老婆打头阵，关员瘦得像根藤，面相有如国营茶楼的豉椒蒸排骨，有棱有角惹不得。他打开我的行装，像外科医生在做心脏手术。内有80多个120和135胶卷，3台相机，一个三脚架。他将各件物品，翻个“六国大封相”，多次细看我的美国护照后，终于发话：

“为什么这个女人不走？”

“她是我太太，我爱人，她等我。”我补充。

“为什么这么多胶卷？”

“我们去桂林、西安、重庆……都要经过申请审批才能去。我在美国大学教摄影的，要拍祖国的壮丽河山，胶卷都用光了。”我没撒谎！条例没有要求这黑白胶卷应该在广州冲晒待检后才出关！可能是他不懂Black and White Negative Film（黑白负片）的英文字样。

“你等一下。”他箭步飞到哨岗楼，与一官员指天画地，翻阅签证。这时，已有三十多位老外跟在后面等待出关，官员大袖一挥，让我们通过。哨岗官员目送我洋老婆，回头用眼角余光“拖”我一把。我则机警地像墨鱼一样溜之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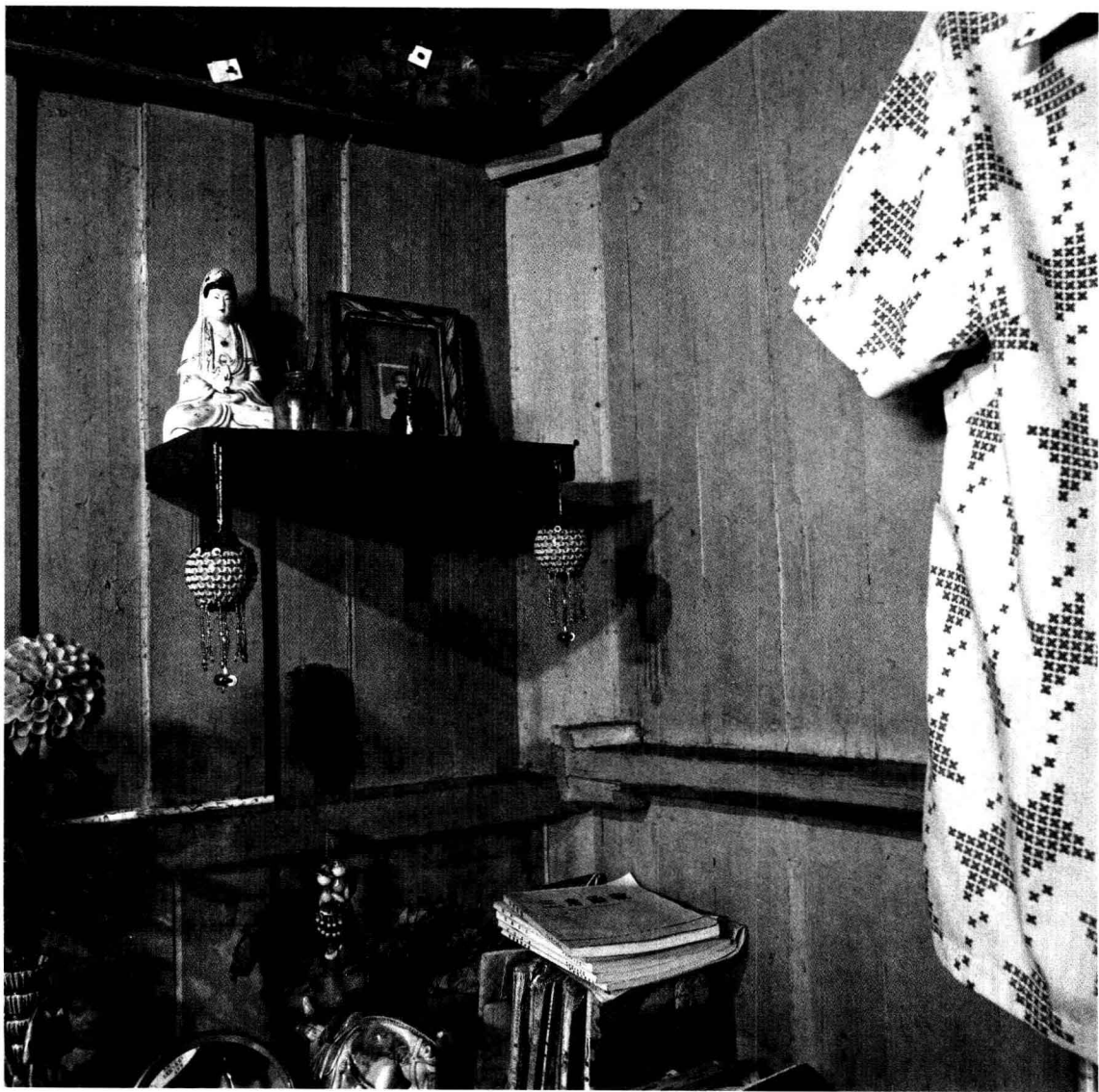
无论如何，中国都像谜一样吸引着我，或者说我迷上了中国。之后，1981年、1982年、1984年、1994年、1995年等等，我不断来中国，带我的儿子一起跑，看我之前看过的地方。到了新世纪，则几乎每年来，近几年还一年来两次。因为中国在不断变化，那人、那事、那城——每次都给我第一次回乡的新奇。

1979—1982 广州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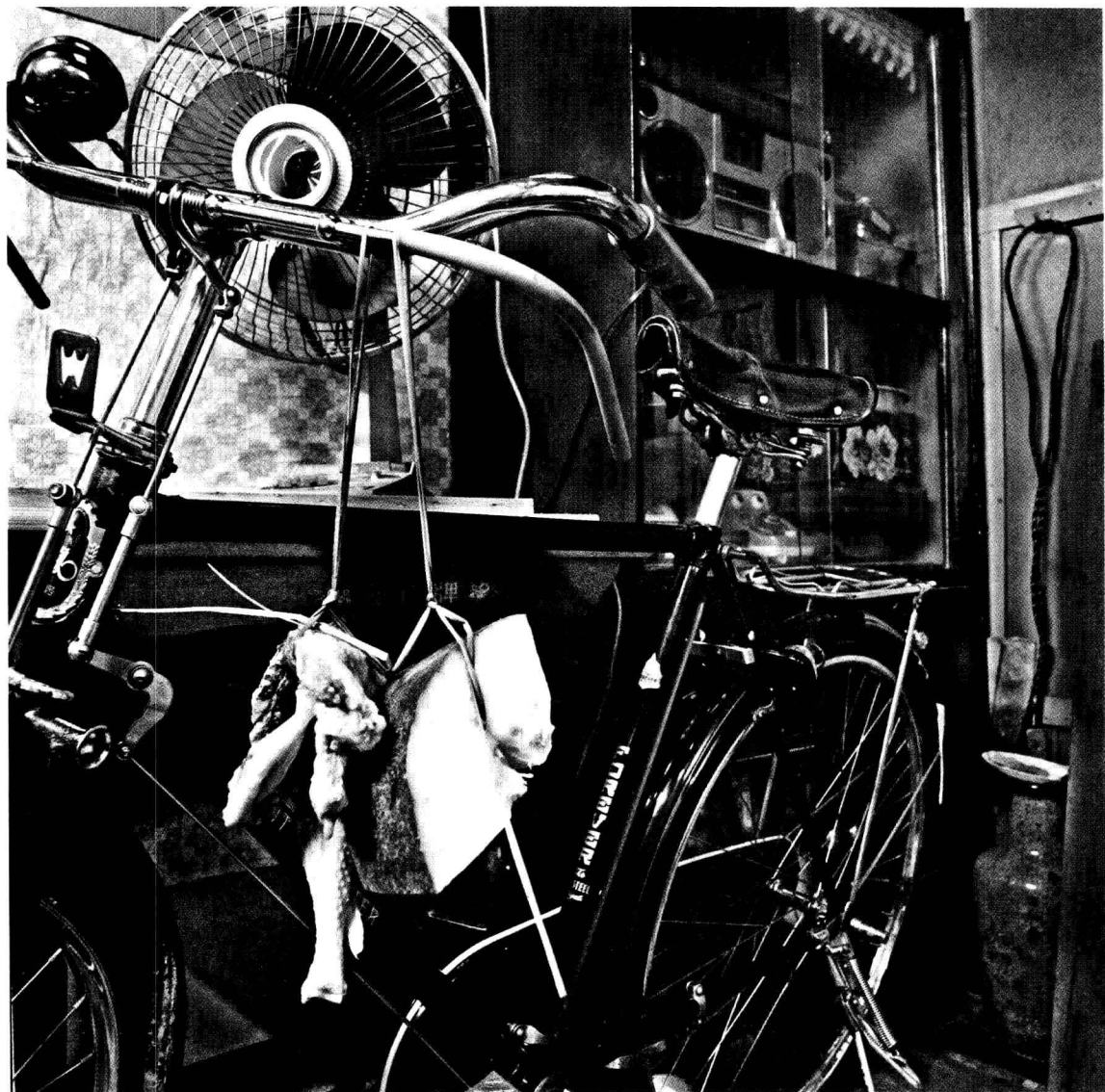
1979年，广州海珠区大南路九号二楼。

城市住宅的公共厨房一角。门口挂把青菜，板壁上用木条钉着两个V，用来置（卡）用了不知多少年的搪瓷碗，每餐会吃光食物，不会有剩，所以厨房可以简单到极点。地下还放置有各家的水（尿）桶。这栋楼里住有五户人家，大便时到公厕，小便使用便桶。



1979年，广州大南路九号司徒家。

桌上是《三角函数》等中学课本。自1977年恢复高考，整个社会对知识、对上大学表现出最为热烈的追求。右边墙上挂着一件当时认为花哨的、时尚的、化纤质地的香港短袖衫。这样挂着，说明主人很看重这件衣衫。



1979年，广州荔湾三楼一住户。
一只鸡、一块冬瓜、一部永久牌自行车、一部香港带进
来的乐声收录机。自行车每日都要扛到三楼卧室里。



1979年，广州荔湾区。

这是客厅。房间太小，东西必须挤在一堆。